

障礙與跨越： 在2010年期待台灣文學史的誕生

文／江寶釵 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如果沒有正確的古典文學閱讀，我們又如何有一本完整的文學史？我們應該如何寄望於未來的文學史編撰？創作活動能量的單薄化，意識形態的紛歧與介入，領域發展的不均衡，現代中文學術的扭曲發展等等，形成了2010年我們在期待一本台灣文學史的誕生時，所必須跨越的障礙。

進入台灣文學領域的研究，不只一次地要去解釋、確認願景的存在。九〇年期待一本文學史的出現，到了跨世紀的一〇年將過，仍然期待的是一本文學史的出現。

引頸盼望的，絕不只是我，尹章義先生為林耀德的《1947，高砂百合》寫的序，萬分遺憾地說，他參與策劃的台灣經驗四十年叢書，其他的全都出來了，只有文學史姍姍來遲，未能現身。「沒有幾個像樣的作家，也沒有幾本像樣的作品，卻又有極其繁複難解的意識形態的糾結，則，文學史的作者當不致如此為難。」他講這話的時候，剛好是1990年。

如今是2010年。我們的問題不見得解決了，在媒體網路化的今日，作家好好出版一本書的機會，一本書被好好閱讀的可能，比以前更為艱難了。為了生活，作家不得不兼營其他專業，他們有的變成了編輯，有的進入了學界，專心致志於創作的，少之又少，能夠孜孜矻矻累積他們的出版成就的，屈指能數，則像樣的作家、可讀的作品幾乎是進入了一種可遇不可求的境地了。除此之外，我們所遭遇的更加困難的問題還有，繁複難解的意識形態的糾結，幾乎已經到了無解的階段。

李昂在中正大學為她籌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裡

做結論，感慨地說，當她回想自己七〇、八〇年代走過的路，雖然尹章義說的是實情，像樣的作家沒幾個，像樣的作品也沒有幾本，但那當下至少文學有理，而且頗不寂寞地，也伴隨著新電影浪潮的崛起，小野、吳念真、侯孝賢，為數不多的幾個人是那麼精采地結合在一起，使得那個時代充滿了光華。但在這幾年，他們幾乎是不合作了，看得見的政治立場，看不見的意識形態，在這裡發揮它們無與倫比的力量，在每個人的心裡颺起裂解的強颶。

當余秋雨到台灣來，為文人談的是政治而感到憂慮，對當代而言，他們就生活在政治裡，不關心政治是不可能的，它非但是現代國民的義務之一，也是知識分子必須的責任。不過，問題的癥結是，當政治所帶來的利益過於龐大，大到足以導致任何被擊中的人，發狂逐風疾走，當這些人是知識分子，利益靠邊站大於文化價值自身的判斷，那麼，文化發展就發生了極大的危機。

但我們所面對的，又何止如此而已？

尹章義指出了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修纂危機，戰前的日治時期、清領時期，都還在摸索的階段，而我們甚至不曾知覺此一匱缺的存在。領域發展不均衡，方言、原住民、外譯文學的投入不夠，特別是

古典詩的研究後繼無人，使得文學史的完整性勢必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而這個問題，與中文學術被現代學院評鑒制度綁架的事實息息相關。

在當代中文學術的研究裡，惟理工學科的評鑒模式馬首是瞻，論述意見的發表是為學者研究成就高低的憑藉，於茲，傳統的學術不復受到應有的重視，這對於台灣文學的發展，產生一定的侷限。主要的原因是，台灣文學的資料散落不齊，許多典章制度隱而不明，若不盡力於整編校注，難以有呈現完整的材料，激發多元、深度的閱讀。易言之，整編是第一層的歷史再現，校注是第一層的文本閱讀。沒有完整的文獻材料，沒有對文獻材料的正確解讀，就沒有後來的研究。此地以古典文學為例。2005年，個人在投入張達修詩詠讚臺灣百首精選的譯注，才真正理解校注所需投入的時間、精力，大舉超乎一般人的想像。為了一個字，一個詞，一個典故，甚至一個字音，翻遍多少書！投入多少人力！碩、博研究生先做校注，經過確認無誤後，再做翻譯。而為了使譯文可讀，必須從頭到尾不斷地進行修訂。

我曾在張達修譯注的序文裡舉例說明其不易的程度，在這裡似乎也適用的。譯注遭遇的問題，有一些是上下文的連貫，如〈壬申台北詩會後陪王夫子及同學留影爰繫以詩〉中的「太史文章牛馬走，遺民歲月鷺鷥盟」，所謂牛馬走，可能不只是指太史公辛苦寫作，而且還牽涉到辛苦寫作是否能如太史公的成就，因而翻譯就變成了：「司馬遷辛勞地到天下四方去遊覽考察，寫下《史記》，萬古流芳；亡國的遺民卻只能過著如鷺鷥般自在的生活。」惟有如此，才能容納張達修的遺民詩人的心聲。有時候，是今古制度的問題，如〈九日登大肚

山〉「登臨興不敗催租，指點中州入畫圖」一句，中州，難道指的是神州？明明在大肚山登高，明明寫大肚山周圍的秋景：「林表寒香黃橘柚，江秋水滿菰蒲」，又如何突然跳躍到中國神州去呢？推敲之下，中州應指台中州。至於若干屬於文字的問題，如王安石「專壑」，是不是「專心於一壑」？還是應該說是「將山林據為己有」這一類的問題，更是不勝其數。

在譯注了張達修詩百首後，我分析當下古典文學閱讀的障礙，有不熟詩人生平、無法把握掌故、隔閡於台灣的時代與社會背景，難以進入詩人的存在情境等等問題。這樣的工作耗費時日，而學界所獲得的成就認定卻甚低。這或者可以說明臺灣古典詩嚴格的逐句逐字的譯注，在這以前不曾見，在這以後到現在，也還是沒有。

張達修的詩集譯注出版後，竟然賣到了第二版。有人問我有意願承做類似的工作嗎？我只能同意做校注是可以的，做翻譯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沒有其他更重要的誘因，張達修這百首詩的翻譯將是我人生中投入臺灣古典詩譯注絕無僅有的一次了。

於是我們的另一問題又來了。如果沒有正確的古典文學閱讀，我們又如何有一本完整的文學史？我們應該如何寄望於未來的文學史編撰？

創作活動能量的單薄化，意識形態的紛歧與介入，領域發展的不均衡，現代中文學術的扭曲發展等等，形成了2010年我們在期待一本台灣文學史的誕生時，所必須跨越的障礙。也許困難將永遠存在，在不同的時代，它們有不同的變形，而不管困難是什麼，向前跨越是我們唯一的方向。☒